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明〕唐伯元 著

醉經樓集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醉  
經  
樓  
集

〔明〕唐伯元著  
朱鴻林點校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醉經樓集/(明)唐伯元著;朱鴻林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4.1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ISBN 978-7-101-09517-3

I. 醉… II. ①唐…②朱… III. 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明代 IV. 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61713 號

責任編輯:李爽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醉經樓集

[明]唐伯元著

朱鴻林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5½印張·2 插頁·34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48.00 元

---

ISBN 978-7-101-09517-3

## 點校本前言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明代廣東澄海縣仙門里人，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生，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卒，是明代後期著名的官員和儒者。明史儒林傳有傳，稱其「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爲嶺海士大夫儀表」。明儒學案也有他的學案，包括了傳記和文字選錄。

唐伯元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由縣學廩生中廣東鄉試，萬曆二年（一五七四）中進士，觀政刑部。同年閏十二月之任江西萬年縣知縣，次年十月改知江西泰和縣。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兩處共計六年任滿，升南京戶部主事，次年到任。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署南京戶部郎中事。是年十一月，朝廷從祀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九）、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於孔廟。次年春天，唐伯元上疏抗議陽明從祀，並進呈其所注釋的古石經大學，請求頒行於天下學校。是年三月，他因反對朝廷成命被降三級調外，貶爲海州判官。在任六個月，升保

定府推官。萬曆十四年升爲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年請告回籍。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起補儀制司主事。次年二月奉命參與選取宮人，事後上宮人疏。是年九月同考湖廣鄉試，十月改補尚寶司司丞。萬曆二十年丁母憂回籍。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冬服闋，以原官起復。後升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進署郎中事，參與萬曆二十三、二十四年文官銓選事情。事後獲推升太常寺少卿（一作太僕寺少卿），未報。二十四年七月，兩上疏請罷歸，獲准。萬曆二十五年抵家，次年卒，享年五十八歲。卒後獲贈太常寺少卿。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廣東巡按御史田生金（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進士）疏請朝廷贈予謚號，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唐伯元子唐彬上疏續請，均未成功。但廣東澄海縣和潮州府皆以鄉賢祀之，江西萬年縣和泰和縣皆以名宦祀之。

作爲行政官員，唐伯元能幹而有惠政。唐彬上疏指出，唐伯元初仕時知萬年和泰和兩縣，「六年之內，得薦九次，諮訪二次，考績治行獨最，紀錄卓異」，因而獲升京職；並且離任之後，兩地都爲他蓋建生祠予以肯定。任官朝廷時，也有優良表現。萬曆十九年春參與選取宮人事後奏上的宮人疏，暴露了當時內宮對宮人的嚴厲苛刻和虐待，選取宮人事情在順天府尤其宛平、大興兩縣民間引起的恐懼，也令到萬曆皇帝對事情產生一定的自咎。最特出的成績，則是如明史所載，在文選郎中任上，「佐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門」。具體的事情是幫助孫丕揚（一五三一—一六一四）制定和

推行掣籤法。這個銓選方法的成效和長期影響還有待深入研究，但時人好評的較多，明史也給予高度肯定。萬曆年間的吏部文選清吏司，是在朝勢力角鬥的場所，也是府所在。文選郎中地位關鍵，因而動輒得咎，在任者如後來的東林領袖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且在萬曆二十二年五月被削籍爲民，隨後的馮生虞（萬曆二年〔一五七四〕進士）也被謫降極邊雜職。唐伯元以清直勝任，正如唐彬所指出，當時「前後秉選者十餘人，多獲譴責，獨臣父任滿六選。」這確是難得的成就。唐伯元沒有留下直接評論當時銓政的文字，但他的兩封請求辭職奏疏，已從涉事人的立場和角度透露了萬曆中期高層政治的困難情況。

作爲學者，唐伯元以堅定反對王陽明心學著名於時。唐伯元崇禮重行，居官和居鄉一以貫之，故此對王學末流信心任性而不修行檢的作風十分不滿。這和他的學問淵源有關。唐伯元少年時主要從父親唐天蔭問學，隆慶五年（一五七一）會試下第後，曾到江西信州師事名儒呂懷（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進士）。呂懷學出甘泉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〇），湛若水學出讓明代理學轉入精微的白沙陳獻章。在宋明理學大師之中，唐伯元最服膺的便是宋儒程顥（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和陳獻章這位師祖。在前代諸子之中，他最佩服隋唐之間的文中子王通（五八四？—六一八？）以及唐代的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唐伯元自己酷好經學，尤其深於易學和禮學。醉經樓集的

命名，正是有取於王通「心若醉六經」一語所致。唐氏的說經和解經方法，有些像湛若水的，也有屬於自得的。他主張「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析而解則晦。」黃宗義（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對此給予高度重視，明儒學案因而抄錄了醉經樓集中全部的「經解」文字。

明代儒者論學，主要以大學的三綱領和八條目為基調，唐伯元也不例外。他強調的學問關鍵是八條目中的「修身」，並且一再論證修身就是八目之始的「格物」的內容。這和當時流行的王陽明學說差異極大。陽明學說最著名的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知行合一」說認為知識和行動一體不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行是知的驗證，不行不足以成真知。因此，在大學「致知在格物」和「物格而後知至」的教旨中，「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而致知就是「致良知」，格物則是「正念頭」，念頭一正，所做之事自然合理停當。良知是人天賦的美善之知，人皆有之，因感而生，不慮而應；致良知便是讓人心本有的善念發揮其應有功能，去應對人所遇到的事事物物。致良知說的重點是行，因此可以說是「知行合一」說的升華；其重要意義，在於讓人自信其心而敢於行動，學者所學因而不至流於空言。致良知說的流弊，是給任性徑情者提供了個人主義思想的論據。王學發展到唐伯元活躍的萬曆時代，王門高弟如王畿（一四九八—一五八三）等所崇奉

的「無善無惡心之體」、「現成良知」等說，非常流行，讓很多離經叛道的行為得到理論上的依據。更嚴重的是，說良知的遠遠多於致良知的，王陽明鼓吹的行的哲學，又變成了說的哲學。唐伯元強調修身之學，本禮之行，在當時有着明顯抗衡陽明學說和強烈批判王門後學的現實意義。

宋明儒者建立理論時，例必透過詮釋儒家經典以成其事。經典的文本及其注解互為因果。文本是論說的基礎，立論者注疏經典不足以闡述意旨時，往往會訴諸經典文本的再認定。宋儒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便是透過論證見於禮記中的大學文本有誤，而作格物補傳，提出著名的格物就是「即物窮理」之說；王陽明則堅持禮記中的大學文本無誤，提出格物致知就是誠意之事，從而否定朱熹之說。唐伯元在論證「修身」才是「大學之道」的關鍵時，也採用了這個傳統做法來建立權威。但他依靠的大學文本，既不是禮記中的所謂古本，也不是科舉定本的朱熹改本，而是後來被證實為嘉靖時豐坊（嘉靖二年〔一五二三〕進士）偽作的石經本。此本唐伯元稱之為古石經大學，其文句次序，和禮記本及朱熹本都不同，還有一些這兩本都沒有的文句，但內容確有可以被解說為突顯「修身」在「大學之道」中的絕對重要性之處。唐伯元誤信此本是孔子之孫子思（西元前四八三—四〇二）所作的可靠原書，為之作了注釋，還上疏要求頒布全國學校，以取代法定的朱熹大學章句讀本。此舉不啻否定明朝行之近



二百年的科舉功令的正確性，但主要還是在於借助經典的文本權威來否定陽明心學的論據。古石經大學雖然是偽作的，但晚明采信者卻頗有其人，像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這樣的名儒也在其中，這個現象在論述晚明思想史時是值得深思的。

唐伯元萬曆十三年上疏抗議王守仁從祀孔廟，是他著名當代和留名後世的主要事情。儒者獲得從祀孔廟，便成了法定的真儒，其學說也在制度上成爲正統學說。事情關係到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士子在科舉考試中的利益，所以從祀議案歷來爭論頗多，往往久而後定。王陽明是明代少有的文武全才，軍功和學術並茂。唐伯元抗議陽明從祀的一個原因，是認爲陽明的人品和學說都不像真儒。他在奏疏中肯定了陽明的事功，但卻借用已存的言論指責陽明「立於不禪不霸之間，而習爲多疑多似之行」；又引陽明自己的文字，指其論說實有「自相矛盾之處」，又有「間爲奇險之論以反經者」以及「故爲互混之論以遁藏者」。他認爲陽明之所以「大發千古所無之異論」，無非是「欲爲千古所無之異人」；並且列舉了與陽明並世的四位名儒質疑陽明之說，以證明自己的分析中肯。唐伯元言詞激烈，時人曾經指出是因不滿王學末流的猖狂表現所致。這樣的從流溯源做法，卻未必能得王學的肯綮。唐伯元抗疏的另一個原因，則是現實的學派競爭。他指責陽明從湛若水論學而有所得，卻有意忽視湛若水學說的來源陳獻章。在標舉自己所屬的江門學派或甘泉學派這一點上，唐伯元並未能超越地域之見和門戶

之見。

唐伯元抗疏的後果和意義不一。由於王陽明是在首輔申時行（一五三五—一六一四）力主之下，與陳獻章和胡居仁同時獲准從祀孔廟的，唐氏此舉無疑是對支持王學的當軸者公開表示不滿，他因而馬上貶官三級，但兩個著名的吏部尚書楊巍（一五一四—一六〇五）和孫丕揚，也因而對他特別賞識和加意提拔，後來還使他能够任上吏部文選司郎中的重要職位。這便透露了晚明學術與政治的緊密關涉之處。另一方面，陽明從祀孔廟雖然成爲事實，但晚明以至清初批判王學之聲不斷，重新重視程朱理學的人物明顯增加；唐伯元的友好之中，像東林名人顧憲成、顧允成（一五五四—一六〇七）兄弟，以實學實行著稱的呂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以經世論著聞名的馮琦（一五五八—一六〇三）等人，都在其中。可見唐氏此舉實在也有嚴肅的學術意義。要之，唐伯元注釋和奏進古石經大學以及抗議陽明從祀孔廟二事，在明代思想史上都別具意義，醉經樓集中所見透視這兩件事情的文字，連同唐伯元其他批判當時主流思想的言論，使此集在研究晚明思想文化史上別具用處。

醉經樓集明代肯定有過刻本，雖然現存的三個版本都是刻於清代的。是集千頃堂書目已見著錄，並且注明是「六卷」。唐伯元卒後不久，其友人周光鎬（一五三六—一

六一六）作他的行略，數年之後其同年郭惟賢（萬曆二年〔一五七四〕進士）作他的墓誌銘，崇禎七年唐彬爲他請謚而上乞賜易名疏，都說唐氏有此集行於世。從是集清刻本書前的萬曆二十四年李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進士）序文，以及高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東唐曙臺明府書中「讀醉經樓集，門下迴瀾障川之功不少矣」的說話推測，此集應在唐氏生前已經刊行。三個清刊本是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唐伯元八世孫唐紹奎刻本、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唐伯元另一八世孫唐際虞補刻本和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普寧方耀（一八三四—一八九一）重刊本。

清代醉經樓集遞刻的情況和內容大概，饒宗頤先生在方刻醉經樓集跋中有過扼要的敘錄，見於饒鏜、饒宗頤合著潮州藝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和饒宗頤潮州叢著初編（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的固菴序跋中，彙錄於下：

唐伯元醉經樓集，明初刻本久佚。乾隆時唐紹奎刻本，世亦絕少流傳。今可見者，惟道光己酉唐際虞補刻本暨光緒丙子方耀翻刻本，兩種而已。道光本板多遺失；光緒本板，舊藏四中學校，今亦不存矣。此本凡分六卷：首卷爲詩；卷二爲經解，即朱氏經義考所錄醉經樓經傳雜解；卷三爲序；卷四爲記；卷五爲書；卷六爲雜著。前有李禎序，唐若時序，并明史儒林傳文。而奏疏，及石經大學，唐彬乞賜易名疏，周光鎬撰曙臺唐公行略，郭惟賢撰墓誌銘，唐

際虞跋尾，并附刻於末焉。據唐彬疏，伯元尚有醉經樓續集，李禎序，謂集中詩文，乃伯元自丁亥迄於丙申之作；然則其在丙申之後作者，當編入續集無疑。考伯元卒於戊戌四月。（見郭惟賢作墓誌銘。）戊戌距丙申未及二年，是所謂續集，今雖未見，意所載文字，卷帙必無多也。

這是饒先生半個多世紀以前所見的情形和所作的論斷，對於我們認識醉經樓集的版本狀況很有幫助。現存的刊本委實數量有限。我見過的，有汕頭市圖書館的一個著錄為乾隆本的刻本，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的一個道光刻本，香港中山圖書館（原孟氏圖書館）以及上海圖書館藏的一個光緒刻本，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一個舊抄本。通過各本原書的對比，可以肯定道光本誠如饒宗頤先生所說，是個補刻本。其所補之本，實即汕頭市圖書館藏的乾隆本，但其所補只是原刻所無的唐伯元行略和墓誌銘兩篇，以及唐際虞的此本跋文而已。此點唐際虞跋中已經透露。跋文說：「丁未，姪廷珍補弟子員，時際虞已注籍訓導，念此後秉鐸不知何地，懼祖德之弗克述，而先芬之弗克誦也，命廷珍就鋟板悉心檢校，而剝蝕壞缺，已逾其半。因思拾其殘而補其闕，檢舊篋所藏，得明周大廷尉光鎬所撰行略，郭大中丞惟賢墓誌銘二篇，叙次紀述，較明史為詳，因附梓於集後，俾世世子孫守而勿替，而當世儒林君子，亦資以考證云。」據此可知，唐際虞並沒有對原刻板本作過大的修補。這樣便有必

要一論道光本和乾隆本的實際關係。

道光本和乾隆本的版式、行款、字體、空格和提行的體式都一樣。兩本同爲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二字；週邊雙欄，惟卷一第一第二頁、第十二至第十五頁，卷二第一第二頁，卷四第一第二頁，「奏疏附刻」第一第二頁、第四十二四十三二頁，共十四頁爲半頁週邊雙欄，以示補刻之區別。全書六卷連同「奏疏附刻」均中縫頂刻「醉經樓集」，中刻卷數及文類，下刻頁碼。惟目錄十四頁，則上端有黑魚尾，中刻「目錄」二字，下爲頁碼。正文遇須尊敬字樣，均空一格；奏疏則正文均低二格，遇尊敬字均提行，或頂格，或空一格，凡祖宗稱號皆出欄上一格，全部依照明代刻本體式。但兩本凡明末諱字，如「檢」如「校」，均未見諱，可見此本並非刻於萬曆或啟禎之世。他字則「寧」字不諱，可證其爲道光之前所刻；而「玄」字末筆不現，「曆」字中兩「禾」作「木」，可證其爲乾隆時代之刻。從附刻唐彬崇禎七年乞賜易名疏之體式仍爲明刻式樣處看，此書初刻實爲六卷，而「奏疏附刻」諸篇或在明末已經補刊，而爲乾隆本所據。

道光本和乾隆本內容上也完全相同，包括刻誤之處在內。兩本均書前冠以寫刻的萬曆二十四年李禎序和乾隆十四年唐若時（雍正四年〔一七二六〕進士）序，序後接以明史儒林傳唐氏本傳，傳後接以本集目錄，目錄之後接以正文六卷，正文之後爲

「奏疏附刻」五十九頁，有疏六首，包括終卷的唐彬乞賜易名疏，以及石經疏後附刻兩篇，篇目均同於目錄所見。此外正文每卷卷端所題書名、卷數和文類，如「醉經樓集卷之一詩類」，文類文字之例用小字，書題行下之刻「澄邑唐伯元著」，惟卷六作「澄邑唐伯元仁卿甫著」等處，亦皆相同。所不同者，道光本有扉頁，右上端刻「道光己酉歲孟冬重修」，中間大字「醉經樓集」，左下端刻「醉經別墅藏板」；內文在「奏疏附刻」之後有周光鎬撰明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曙臺唐公行略、郭惟賢撰明故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曙臺唐公墓誌銘兩篇以及「道光己酉年孟冬月八世孫」唐際虞撰跋一篇。這三篇目錄屬之「續附刻」部分，實即道光本所補刻的全部內容。行略、墓誌銘兩篇，刻本字體較爲纖細，不類其他；版心上端有黑魚尾，亦與前此諸卷不同。行略中「寧」字諱作「甯」，可見此篇爲道光時所刻。

綜合這些版刻現象可見，道光本和乾隆本其實是屬於同一刻本。道光本所據之板即是乾隆刻本之板；其補刻者，只有周光鎬、郭惟賢和唐際虞文字三篇。現存汕頭市圖書館的乾隆本所見的十四頁補刻，從字體和刻工看，都與道光本「續附刻」三篇不類。故此可以說，現存乾隆本雖然未必是乾隆時代的印本，但卻應該是早於道光時代的補刻本。此本全書盡「奏疏附刻」而止，其印本漫漶之處，也較道光本少。這點也可以旁證晚出一百年的道光本是根據同一版本刷印的。

光緒二年的方耀重刊本，内容和道光本完全相同，惟以唐彬之乞賜易名疏歸入「續附刻」中。此本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頁週邊雙欄，版心刻字亦如道光本，上刻書名，中刻卷數及文類，下刻頁碼，惟書名下有黑魚尾不同；遇尊敬字不擡頭，避清諱，或作別字，或作缺筆；扉頁中刻「醉經樓集」，右上角刻「光緒二年重刊」，左下角刻「潮州金山書院藏板」。萬曆李禎序、乾隆唐若時序，目錄，附明史儒林傳以及各卷正文，並奏疏附刻、續附刻及道光唐際虞跋，次序均如道光本。惟每卷文後隔一行刻「後學普寧方耀重刊」，而第四卷及附刻、續附刻未見；全書最尾一行左下角小字雙行刻「羊城內西湖街富文齋承刊印」，可見此本刻於廣州。此本翻刻時當有校勘，惟所更改文字，頗有誤會原刻之處。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舊抄本，目錄、編次、內容、體式、行款、擡頭字樣、誤字等處，均如乾隆本及道光本，惟闕原本書前之李禎序及唐若時序、書末之唐彬撰乞賜易名疏。這個抄本似非根據汕頭市圖書館藏本抄寫，因為乾隆本和道光本目錄卷六有「立俊說」一題，「俊」字實爲「後」字之刻誤，汕頭市圖書館藏本有墨筆校正此字，而抄本仍然照誤（黃挺教授首先注意到此點）。這個抄本中的清諱「寧」字，不用正字，偶以俗字代替，更多的是末二筆缺筆（如卷五啟大宗伯沈公二首之一、答周濟甫大中丞二首之一、答郭夢菊大參各一見，答周時甫三見，附刻從

祀疏二見，再請告疏一見），可見其爲道光或之後所抄。其所據者爲乾隆本抑爲道光本，則不可考。

醉經樓集還有一個選本，收入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順德馮奉初題詞編刊的潮州耆舊集第二十四、二十五兩卷，題作唐選部醉經樓集。卷二十四收疏四首，卷二十五收序、記、書及雜著三十四題三十八首。其中卷二十四爭從祀疏又因所據本漫漶而致闕文十二處凡一百二十三字。從編者無法爲之校補處看，醉經樓集原書當時傳本實屬稀有。

現存諸本之中，乾隆本和道光本在卷一、三、五、六以及奏疏附刻卷都有漫漶蠹蝕之處，而且所在板面相同；光緒本和抄本則皆文字完整，可以補救該兩本之闕。抄本文字不像光緒本之時有改動，尤其可貴。由於道光本的刻板本來便是乾隆本的，又有補刻的內容，所以雖有漫漶之處，這次整理，仍然以之爲底本，並且保存了原本的編次。因爲光緒本和抄本都有校改之處而沒有校記，所以本書在校勘方面，雖以道光本爲據，於諸本異同之處，仍然參互出校；有所取舍和有所懷疑時，都在校記說明；有諸本皆誤而考訂改正者，也在校記說明原因。其他俗字、異體字以及光緒本常見的諱字，徑改不再出校，通用字則儘量照原本所見。此外，由於明儒學案比乾隆刻本早出，而其中所載的醉經樓集解文字，與醉經樓集刻本卷二「經解」諸條間有差異，故此也被



用來校勘此卷。集中所載的唐伯元其他著作的序跋，如銓曹儀注和二程先生類語兩書的，也用該二書明刻本參與校讎。

醉經樓集在明清二代刊行的理由不一。唐伯元看來是有所爲而著書和刊行的。李禎萬曆二十四年序稱，孔子之後，楊墨並興，賴孟子作而排拒之。此後有佛老之徒出，近世又有以儒自稱的新學之徒出，「聖道否剥殆盡，良可懼焉。吾友唐仁卿氏有憂之，自丁亥迄今歲，凡十年來所著，有醉經樓一集，曰詩、曰經解、曰序、曰記、曰書、曰雜著，凡六卷，時而歌詠，時而解釋，時而問答，時而鋪衍，無之非是心何以病道，慧何以傷神，直斟元酒明水之味，力釀經術，俾世之醉經而醒道，勿失吾家無量不及亂之初意，意念深矣。吾再復之鬯然，竊爲世道一快」。此說顯示了醉經樓集有高度的針對性，是唐伯元十年間對抗王學空疏者的集中表現，其結集刊行，存着一股濃厚的衛道意味。

乾隆十四年醉經樓集再度刊行，澄海知縣關中唐若時所作序文說：「吾讀醉經樓一集，知先生慨正學之弗昌，懼新說之日熾，毅然以道自任，直接宋儒之源流，而疏濬決排之，以廣其教於天下，故凡奏疏、辯解、書記、叙說，以及雜著、詩歌，無一不沈酣於六經之津液，而去其糟粕焉。雖片語單詞，無不從箇中體貼出來，夫豈矜才尚